

總理學說研究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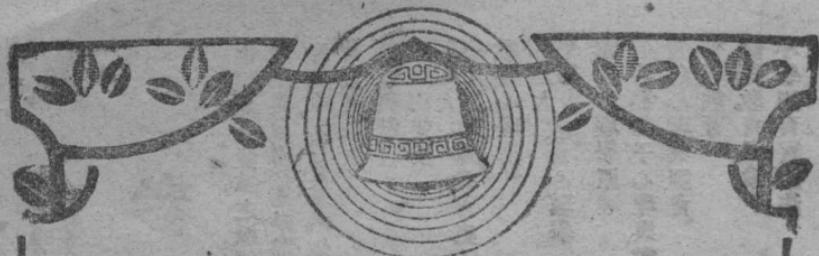
張志智編著

中山先生之教育思想



正中書局印行

丙



版權所有必究
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二月滬一版

中山先生之教育思想

全一冊、定價國幣一元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張志

發行人 吳秉智

印 刷 所 正 中 書 局
發 行 所 正 常 常 智
行 人

中書局

(1243)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九月購

陳序

國家之事，千頭萬緒，概括之，管、教、養、衛四事而已。斯四者，又復相因相成，分工以增其效率，合作以成其共的者也。是故教之爲用，所以造就通才與專才，具有自治治事（管）之德，自養養人（養）之智，與自衛衛國（衛）之勇，以備國家社會之需也。在個人以立志爲先，使堅其自信，在國家以信道（道即今之主義）爲主，使成其共信。夫然後百般事業，爲無數有志之士所追求與服務，創造之力乃無止境；建國方案，爲多數同志之國民所篤信與奉行，實現之期始可預致。教育之目的如是而已，中外古今不能變也。

總理中山先生創知難行易之學說，徵民生爲人類歷史進化之中心，蓋欲以此立教，挽救國民醉生夢死淺知不行之弊，而臻國家於平等自由之域焉。苟人人能信知之難，則必學而求之，因而求之，以破其所難。苟人人能信行之易，則言之必行，行之不懈，以證其所易。苟人人能篤信民生爲歷史進化之中心，則於生存之所需，必求「真」以創造之，於其生之維繫，必推「愛」以服務之，於生命之持續，必盡「力」以奮闘之。創造服務與奮闘三大精神繼續不已，則民族之生命光大無止境，教育之功效，始可以見之矣。

夫求「真」所以成智，推「愛」所以行仁，培「力」所以致勇，而統此三者之原動力則爲「誠」。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易言之，信仰爲求學做人造物成事之原動力，無信仰

即無力量，無力量則生命之存在維繫與持續均不可能，又安能期其光大哉？孔子以誠爲施教之中心，而以修道爲施教之主旨（修道之謂教）。與中山先生以信仰爲力量之源泉，三民主義爲救國施教之基礎，其道果無二致也。吾故曰：「大勇生於大智，求智原爲求仁。創造服務奮鬥，全憑無間精誠。」而教育者對於人才之培養，應以造成下列之四大條件爲其共同之理想：

- 一、能自信而復能信道——教育之目的——教——文化
- 二、能自治而復能治事——德育之目的——管——政治
- 三、能自養而復能養人——智育之目的——養——經濟
- 四、能自衛而復能衛國——體育之目的——衛——軍事

務使學以致用，人盡其才，庶幾主義能行，民族獨立、民權普偏、民生發展之目的能達，教育乃能成爲民族復興、文化復興之原動力焉。

志智同學以所著「中山先生之教育思想」一稿見示，書此以應。

陳立夫

民國廿七年十月十八日於漢口

自序

一個時代的教育，必以當時某種教育思想為基礎，至少要受到時代教育思想的種種暗示。從教育史上觀察，古代柏拉圖的國家主義的階級教育思想是當時希臘階級教育的背景，十八世紀盧梭的自然主義教育思想，是當時個人主義教育的背景，近代詹姆斯和杜威的實效主義教育思想，也是近代美國實驗主義教育背景。歐戰以後，蘇俄意大利兩個國家的教育實施，最為人所注目，然而這兩個國家的教育，也都與他們建國的心理想完全一致，即是說，信奉法西主義的意大利，便有法西式的國家主義教育，信奉馬克斯主義的蘇俄，便創立以共產主義為中心的勞動階級教育。這些史實，均足以表明教育思想影響教育實際的重要性。倘若一個國家，忽略了他本國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不從事於建設他本國特有的教育理想，祇在教育實際活動上——教育制度教育方法等——抄襲他國的成規，企圖以他國已獲成效的辦法，解救本國的教育問題，頗付本國的教育需要，其結果未有不痛遭失敗的。蓋因甲民族心理特性，與乙民族的心理特性不同，甲民族所特有的某種感覺與思想的方式，不能轉授與心理組織不同之乙民族。同樣甲民族的教育思想，亦不能完全適應於乙民族。所以在西方明明是好的制度，好的方法，吾人去學了過來，就完全變壞了。而且近數十來年因為多種教育制度及教育方法的試驗，益陷吾國教育於極混亂衰頹的境地。我

們並非反對效法人家（實則效法與模仿略有不同，即前者是取法乎上的意思，含有選擇取捨的作用，後者是隨聲附和，而有依樣葫蘆的嫌疑），不過應當以本國的中心教育思想做依據，方可拿他國的優異，做本國的「他山之石」，拿他國的缺陷，做本國的「前車之鑒」。何以說教育思想如斯重要呢？因為任何一種教育思想，都是時代的產物，用來解決當時教育問題的工具，某時代有某時代教育思想，是那時社會上種種需要有以構成的。同一軍國民教育思想，在中國與在日本便發生不同的作用。世界上不會有環境相同的國家，自然也不會產生同一的教育思想，在不同的教育環境中所有教育實際活動的演變，當然也就發生差度了。

中國近數十年來，不斷的受着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經濟上政治上急劇的變化，教育也隨着政治經濟的變化而發生變化。始而「日化」，繼而「歐化」「美化」，然而每次的改革，都是囫圇吞棗的抄襲，盲目超時心理的衝動，所以任何優良制度或方法，一經傳到中國，便會即刻變質，運用失效。溯自北伐完成以來，中國教育，仍然操諸一般舊勢力者手裏，三民主義的精神，還不會進入教育的內層，於此我們可以說，近代中國教育失敗的第一原因，是由於中國缺乏一種中心教育思想。

教育救國的老調，固然不免把教育的身價估得過高；但是為要樹立民族永存的基礎，則教育的良窳，實有莫大的關係。教育的功效，不是三年五載可見收穫的，「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其間因果關係至爲密切，我們要想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出現，只有從今天起，播種三民主義的教育種子，不然十年或數十年以後的中國教育也許比現狀格外混亂；目前中國教育的危機和缺陷，已是無可諱言了，國內外教育專家有不少嚴格的評論，並且提出各種不同的改革建議，各有立論根據，各能自圓其說，然而他們共同的缺點，仍在於不會把握住中國教育失敗的根本原因，不會認清中國教育改造的根本問題。他們所認識的中國教育問題，是教育上的技術問題，而不是教育的中心問題；他們所擬的改革建議，也只算得枝枝節節的意見而已。普通的論調每謂中國教育失敗於模仿抄襲，不合國情，不合社會需要；但他們沒有更進一步去探求所以模仿抄襲以至演成不合國情不合需要的究竟。我以為中國過去教育的失敗，絕非模仿抄襲，亦不在乎超時革新，乃在於我們缺少一種中心信仰和中心思想，所以今後中國教育的改造，首應確立我們的教育理想，在我們教育理想的標準上，衡量先進各國的優劣，凡是合於我們理想的制度，任何方法，我們都可勇敢的接受過來。反之，凡與我們理想不相符合的，我們便無須再去嘗試，再去盲從了。惟有先建設中國的中心教育思想，纔能鑒別各式各樣的新制度新方法；亦惟有確立中國的教育思想，纔會運用先進各國的成法。

近代中國的教育，正與中國的政治一樣，好像有千萬個問題，任你從教育的那一方面推究，總有問題發現，所以懶教育的、不懂教育的、辦教育的、乃至和教育毫不相干的人

們，都可信口評論，而且都能找出問題的一二要領。近幾年來有一句流行的口號，「教育破產」，幾乎普遍各個知識分子的心裏了，尤其是因為國家遭受到空前未有的國難，大家更把教育看得一文不值，連辦教育的人也被輕視起來，在教育界裏，雖然也常發出不服的呼喊，終久敵不過輿論的譴責，因而想出種種改進辦法，如提倡生產教育啦，公民教育啦，軍事化的教育啦，民族中心教育啦，以及最近所謂國防中心教育啦，無非是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還不能算是解決中國教育問題的根本辦法。前面已經說過，中國教育失敗的根本原因，是缺乏中心教育思想，因為沒有中心教育思想，所以沒有理想的目標，因為目標不會確定，所以沒有堅強一貫的教育主張，教育制度上、方法上，也就沒有自動創造的精神和努力了。因為不能自動創造，就免不了要模仿抄襲的毛病。歸根到底還須首先建設中心教育思想。

教育是政治的工具，無法脫離政治而獨立，換句話說，中國的教育必須與中國的政治一致，中國建國的中心理論，便是建設中國教育思想的唯一根據，現代的中國，是三民主義的中國，所以現代中國的一切建設，都應以三民主義為最高原則，教育是一切建設的基本建設，尤須以三民主義的理想為依據，以三民主義的原則為原則。關於教育原理、教育方法，孫中山先生不是教育專家，不會明白指示我們；但是從三民主義的側面，可以發現了，孫先生在教育上的中心思想。更可從知難行易學說中，建設一種知難行易的教育學

說，根據 孫先生的教育思想和知難行易的教育學說，估價一般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
尋求中國教育改造的途徑，纔是探討中國教育改造問題的先決問題！

本書承吾師陳立夫先生惠賜序文，同學李爲章育才協助整理原稿，深爲感激，並此誌
謝！

中華民國廿七年六月六日作者謹識。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近代中國教育失敗的原因 ······

第二節 研究中山先生教育思想的動機 ······

第三節 研究中山先生教育思想的方法 ······

第二章 中山先生的教育主張

第一節 中山先生教育思想的發軔 ······

第二節 中山先生教育思想的要義 ······

第三章 三民主義教育的基本精神

第一節 三民主義與教育 ······

第二節 三民主義教育的基本精神 ······

第四章 知難行易學說與教育建設

第一節 知難行易學說的特質 ······

第二節 知難行易學說的理論基礎 ······

第三節 知難行易學說在教育上的價值 ······

三

次

第四節 知難行易的教育學說………八五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近代中國教育失敗的原因

自從同治元年(1862)，滿清政府採行新教育，設立學校以來，到現在已經有七十年的歷史。在這期間我國的教育由舊時書院學塾的制度解放出來，經過許多次的模仿，許多次的改革，直到現在，從我國教育的外形上看，固然已有很大的進步，但是從我國教育的內容上來看，我國教育始終還未能確切達成其使命。回顧已往三四十年來新教育的推行，不能不說中國的教育未能得着相當的成功。

現在我們要建樹中國教育的中心思想，並依據這種思想而作切實的推行，必須首先把我國已往教育失敗的原因，加一番檢討，同時更針對立國的精神與當前的需要，而建立起我們應有的教育信仰來。

我國近幾十年來興辦新教育之所以失敗，約有下列諸原因：

一、無一貫的中心政策 我國近幾十年來新教育的倡導，是因為近百年來經過重重的

國難，得到創痛的教訓，然後激發出來的。鴉片戰爭的失敗，驚醒了國人的迷夢。接着英法聯軍入北京，不久日本取了琉球（1879），中法戰後，法國併吞了安南（1885），英奪了緬甸（1886），中日戰後，日本併了朝鮮，占了台灣（1895），德又占了膠州灣（1897）。最後有曇花一現的維新變法——「戊戌政變」（1898），而以「義和團」之役（1900），八國聯軍入北京，訂結辛丑和約（1901）的結局，重重國難，列強向我國愈迫愈緊，在這短短幾十年的歷史中，印着無數國恥的傷痕。帝國主義斷是如此的積極侵略，挾其堅船利礮，無所不爲，我國屢次抗戰，又遭敗北，因此，不得不從多方面設法抵制，而其根本乃在從教育着手，設立學堂，派遣留學生，培養匡時濟世的人才，同時並講求軍備製造，以爲抗強禦暴的後盾。所以我國近幾年來新教育產生的動因是受了外交和戰爭失敗的影響，一切進行的辦法都是被動的、模仿的、消極的。自從開始實行新教育以來，已經經過好多次的變更，但是始終沒有一種一貫的政策，始終沒有一種通盤的籌劃。當初的新教育是從兩方面着手，一是方言教育，養成熟諳外國語言文字的人才，以辦理交涉和洋務爲目的，例如乾隆二十二年開設俄羅斯文館，同治元年設立京師同文館，專教英法德俄語言文字，次年上海設立廣方言館，廣州又設一個同文館，這都是因爲中外交涉日繁，爲應急起見，「必諳其語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當時的大臣們因爲辦外交，吃了不諳外國語文的虧，已經認識語言文字有很大的作用，殊不知語言文字不過是一種工具而已，要想不受人欺蒙，除了熟諳其

語言文字之外，還必須有其他的條件，必須有整個政治的革新，如文化發達、學術昌盛、政治清明、經濟充裕……等等，這些都是西洋人侵略的利器，那時的人，不在根本上着想，而希望只要培養些翻譯的人才就可以辦外交，這未免捨本逐末了，雖當時也有見得到的人，如張之洞在湖北自強學堂的堂示上說：「本部堂意在造就通材，所期遠大，欲使學者皆能自讀西書，自研西法，則可深窺立法之本源，並可曲闡旁通之新義，既不必讀輾轉傳繙之書，致得粗而遺精，亦不致墨守西師一人之法，致所知之有限。將來學成之後，通殊方之學，察鄰國之政，功用甚宏，實基於此」。雖然張氏所期遠大，但是這種教育設施沒有自己的中心主張，徒然做了一些販賣的工作，既沒有適當的課本和教材，又不適我國的通情，而祇從語言文字上去研究西法，要想學成以後，通殊方之學，察鄰國之政，周知情偽，取人所長，這未免期望太高了。

方言教育的成效既如此，再看軍備教育的產生，關於這方面的，有科學製造遊學和水陸軍學堂鐵路電報學堂等，同治五年（1866）總理衙門奏擬招考天文算學人員，即注意到要中國自強，必須能製造機器輪車，而要製造機器輪車，又必須洞徹天文算學的人才。所以同治五年左宗棠在福州設船政局，以為船政根本在乎學堂，同時設英文法文學堂、駕駛學堂、管輪學堂、繪事院、藝圃。光緒五年以後，各省大吏，紛紛請設軍事訓練機關，李鴻章在北洋設水師學堂、武備學堂；張之洞在廣州設陸師學堂、水師學堂，曾國藩在上海

設製造局附機器學堂，在南京也設水師學堂，這些專科學校，都是爲應急的需要，專門培養軍事和技術人才的。當時更派遣人員赴歐美各國遊學。總之這種種設施，其根本目的，在圖自強，而欲圖自強必先興軍政，欲興軍政，必先能製造，欲能製造，必先通數理之學，欲通數理之學，必求之於泰西各國，然後本源可徹，歸而觸類旁通，則西人擅長之技，中國皆能盡悉，然後可以漸圖自強。不料結果完全相反，因爲當時科舉之制，還是根深柢固，留學生並非出身科舉，難於仕進，往往爲世所輕，「其或致身通顯，則反與其所學無與」。結果西藝西文，流於形式，「科學課目與四子書同爲記誦之學，備畢業等第之考核而已。彼製造局所譯各書，能精通者，世不多見，然而市儈之徒，改頭換面，變而爲富強叢書、西學時務通考、西學大成等書，供士子場屋之用，而一般士子生吞活剥，逗湊鋪張，目的只在博得學通中西之名」。新興學的結果，不過如此，怎能達到富國自強的目的呢？所以抵抗列強的新教育固然作了許多設施，但是仍舊沒有什麼功效。馴致列強的侵略愈益變本加厲。其中原因，李端棻在光緒二十二年的奏疏中說：「夫二十年來都中設同文館，各省立實學館、廣方言館、水師武備學堂、自強學堂，皆合中外學術相與講習，所在而有。多未肄及，其未盡一也。格致製造諸學，非終生執業，聚衆講求，不能致精，尤非遊歷察勘不能確。今之諸館未備圖器，未遺遊歷，則日求於故紙堆中，終成空談，無自致用，其

未盡二也。利祿之路不出斯途，俊慧子弟，率從事帖括，以取富貴；及既得科第，遂與學絕，終爲棄材。今諸館所教，率自成童以下，苟逾弱冠，即已通籍，雖或向學，欲從末由，其未盡三也。巨賈非一木所能支，橫流非獨柱所能抵，天下之大，事變之亟，必求多士，始濟艱難。今十八行省祇有數館，每館生徒祇有數十，士之欲學者，或以地僻而不能達，或以額外而不能容，即使在館生徒，一人有一人之用，尚於治天下之才，萬不足一，況於功課不精，成就無幾，其未盡四也。此諸館所以設立二十餘年，而國家不一收奇才異能之用者，惟此之故。……王鳳喈說：「此時期之學校目的不外三種，一在養成翻譯人才；二在講習礮船制用之方；三在學習工業。對於教育根本事項，全未顧及。又承科舉之餘弊，組織課程，均不能脫離書院制度，以及經義之陋形。在朝廷的人，除少數先覺者外，均持反對態度，以模彷西洋爲可恥。而辦學者對於西洋文明，無徹底了解；對於舊教育，無徹底廢革之決心，對於新教育，無大規模的計畫」，故此期教育未能收到很大的效果。

總之，在我國實行新教育之始，完全受了外鑠的影響，生吞活剥的抄襲模仿，急不暇擇，專事依樣葫蘆。殊不知西洋的文物制度，自有其發生的淵源，有其歷史的背景，我國當時執政者不從整個政治社會經濟來着想，而希望從方言教育和軍備教育培養一些似通非通的人才，以爲就能交涉勝利，挽回國運，真是南轅北轍了。

自此以後，幾十年間的教育，雖然已有許多次的變更，但是始終未能顧及教育與立國

建國的關係，這是因為對於立國的精神沒有透徹認識之故。自光緒二十八年建立新教育的學制以來，教育宗旨方面有好多次的變更，如光緒三十二年的「忠君，學孔，尚公，尚武，尚實」，民國元年的「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主義，軍國民主義輔之，更以美感完成其道德」。關於學制系統，有所謂壬寅學制、癸卯學制，以及民國十一年的新學制。都只在模仿日本德國美國法國教育的外形，從沒有人從中國的立國精神、政治理想以及社會環境上，創立一種中國的教育政策。非但不能如此，並且在五四運動以後，舊思想舊信仰已經完全破壞，但是沒有新思想新信仰的建立，於是凡是世界上各種政治主義，各種經濟思想，皆在這時乘虛而入。自民八以後，思想界的紊亂達於極點，在政治上有倡無政府主義者，有倡國家主義者，有倡法西斯主義者，有倡蘇維埃組織者；在經濟上有主張共產主義者，有主張國家社會主義者，有主張基爾特主義者，有主張集產主義者。教育界在這種混亂的潮流中，也時而趨重民主主義，時而趨重國家主義，時而主張軍國民主義，時而主張大同主義。自十一年以後，國內思想龐雜，各種政黨乃以一般青年學生為宣傳的對象，教育成為政爭的工具，以致教育的效率互相減殺，所以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宣言中說：「教育變為政爭之用品，由互爭而互鬭，由互鬭而相殺，」「歷時愈久，流毒愈深，不但教育破產，一切社會機能皆將瀕於絕境」。由此可見我國歷來的教育，因為缺乏一種中心政策來領導各種設施，以致不僅使教育破產，並且影響到國家的根本。